

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

——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

——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沪东造船厂工人理论组编写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工农兵学员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

——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沪东造船厂工人理论组编写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工农兵学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125 字数 64,000

1976年7月第1版 1976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171·77 定价: 0.18元

前 言

毛主席发出进军号，船台架起万门炮，

万炮齐轰邓小平，掀起批修新高潮。

跨进沪东造船厂的大门，走道两旁革命大批判栏贴满大字报、大标语；从机声隆隆的万匹机试车台旁，到焊花纷飞建造万吨轮的船台上，造船工人口诛笔伐，挥戈上阵，愤怒声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动罪行，狠狠回击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当前，广大职工结合工交战线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条例》），掀起批邓新高潮，推动了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

工人阶级是批邓的主力军。去年，当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肆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黑货，刮起右倾翻案风时，沪东厂的工人就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工人同志说得好：“不管右倾翻案风从哪里刮来，不管是八级还是十二级，我们就是要开顶风船，与修正主义对着干！”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一开始，沪东厂工人立即投入战斗。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鞍钢宪法”，今年二月初，就开始对《条例》进行了批判。通过调查分析、专题批判，广大群众剥下了邓小平的画皮，看清

了《条例》是工业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邓小平挥舞着三根鞭子：一根“钢鞭子”，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一根“金鞭子”，搞物质刺激，腐蚀工人队伍；一根“洋鞭子”，鼓吹崇洋迷外，爬行主义。三根鞭子，一个目的，就是要打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复辟资本主义。真是“砒霜里掺辣椒——毒辣透顶”。通过学习和批判，进一步看清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同党内资产阶级坚决斗！

在党中央两个英明决议的鼓舞下，广大职工更加斗志昂扬，对《条例》的批判进一步深入，写出了一大批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摆事实、讲道理，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厂工人理论组和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一九七六届毕业班的部分工农兵学员，共同战斗，编写了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可能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六年七月

目 录

要害是搞翻案复辟

- 邓小平授意炮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
若干问题》的险恶用心 1

阶级斗争熄灭了吗？

- 评所谓“工作总纲” 8

“加快”到哪里去？

- 评所谓“为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而斗争” 15

一个换班夺权的大阴谋

- 评所谓“整顿领导班子” 23

依靠还是镇压？

- 评所谓“依靠工人阶级” 30

大叫“整顿” 意在复辟

- 评所谓“整顿企业管理” 37

一条无形的锁链

- 评所谓“严格规章制度” 46

决不容许重搞“条条专政”

- 评所谓“两个积极性” 52

“引进”还是“陷阱”？	
——评所谓“多引进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	58
资产阶级法权的忠实卫道士	
——评所谓“按劳分配”	65
蜜糖包的砒霜	
——评所谓“关心职工生活”	72
“白专”是修正主义的死胡同	
——评所谓“又红又专”	80
折中主义的手法 修正主义的嘴脸	
——评所谓“思想方法”	89

要害是搞翻案复辟

——邓小平授意炮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
若干问题》的险恶用心

建国二十多年来，工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未停息，一直是相当激烈的。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于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授意炮制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条例》），公开树起了一面在工业战线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旗。《条例》出笼后，党内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依照邓小平的意旨，迫不及待地大砍新生事物，打击新生力量，妄图在工业战线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重新推行过去被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路线。工人群众气愤地说：“什么‘加快工业发展的问题’，我们看是搞翻案复辟的黑旗！”搞翻案复辟，这就是《条例》的实质。我们剖析一下《条例》出笼的背景，贩卖的货色，玩弄的手法，追溯其根源，看邓小平究竟要把工业发展加快到哪条路上去？！

《条例》的出笼，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战斗洗礼的

中国工人阶级，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坚持工业学大庆，整个工业战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跃进景象。一九七五年二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加强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进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可是，邓小平却把工业战线的大好形势描绘成一团漆黑，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算帐翻案；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极端恐惧，百般干扰。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邓小平正是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象挖掉了他的命根子，因此再也按捺不住恐惧的心情，疯狂进行反扑。一九七五年五月，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面杏黄旗一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到处活动，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科技界和某些部门的少数几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齐跳出来，到处讲演，大肆放毒，散布了大量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奇谈怪论。夏季前后，政治谣言四起，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邓小平到处叫嚷要“整顿”。在他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中一连提出九个“整顿”，什么“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九根大棒一齐下，一

句话，要全面整顿，全面反攻倒算，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清华大学少数几个人写诬告信，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猖狂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邓小平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纲领和路线，一方面在上层建筑领域，拟订《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筹备出版刊物，炮制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另一方面在经济基础各个部门，篡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十分重视工业这块重要的阵地，企图把社会主义工业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一再叫嚷：“企业要整顿，看起来企业问题不少”，“现在是积重难返”，“矫枉必须过正”。他不仅在大会讲，小会吹，还直接插手，组织黑班子，亲自授意炮制一个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八月间，就在右倾翻案浊浪滚滚的时候，经过多次修改的《条例》破门而出。《条例》的出笼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选择出笼的时间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邓小平抛出《条例》，是他右倾翻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妄图利用条例、规章的法定形式，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所以，《条例》是在工业战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条例》的炮制者打着“整顿”的旗号，开了一大堆“治乱纠偏”的处方，声称：《条例》的中心是“解决怎样加快的的问题”。造船工人一眼就看穿了毒心，尖锐地指出：邓小平“加快工业发展”是假意，复辟资本主义才是真心。让我们剥下《条例》骗人的画皮，看看在发展工业以什么为纲，依靠什么人，走什么道路等问题上，邓小平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切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在“纲”上做文章。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五月把“三项指示”说成是“一个时期的纲”，到八月又说成是“一切工作的纲”，而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就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指出“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纲”。在“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指导下，《条例》闭口不谈工业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谈工厂主要任务是落实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生产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谈“鞍钢宪法”是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在《条例》中所贩卖的完全是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黑货。

要使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就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决定企业性质、方向、路线的根本问题。文化大革命后，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体现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广大革命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可是，邓小平为了推行其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需要，咒骂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软、散、懒”，新干部是“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扬言要对工人阶级“作阶级分析”。邓小平还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种所谓“相对依靠”，实质上是不依靠，反对依靠。他究竟要依靠谁呢？靠的是那些“横下一条心”、“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党内不

肯改悔的走资派，靠的是少数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这充分暴露了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丑恶嘴脸，暴露了邓小平拼凑黑班底，企图换班夺权的阴谋。

要发展工业生产，必须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参加企业管理，必须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而邓小平认为加快工业发展，要利用三根鞭子：一根是“钢鞭子”。邓小平提出“整顿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恢复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卡、压的规章制度，束缚工人的手脚，使工人重新沦为机器的奴隶。一根是“金鞭子”。邓小平用所谓“反对平均主义”，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用所谓“关心职工生活”，搞物质刺激，腐蚀和分化工人队伍。一根是“洋鞭子”。邓小平打起加快工业发展，采用先进技术的幌子，依赖外援，鼓吹对国外技术要“多引进”，“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完全暴露了邓小平崇洋迷外，企图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附庸的卖国贼的真面目。工人群众一语道破了它的反动实质：“三根鞭子，一个目的，邓小平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已经破产，被广大群众批得臭不可闻。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要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煞费苦心，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不仅打着红旗反红旗，用“革命”的词句，来掩盖他复辟倒退的勾当，而且继承了老修正主义者的衣钵，大肆玩弄折中主义的故伎。邓小平用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的手法，炮制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一会儿说，“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一会儿又说什么“不注意生产，不努力搞好生产，把生产放在可有可无，可重可轻的地位，也

是很不对的”，兜售唯生产力论黑货。一会儿说“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会儿又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以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诸如此类折中主义诡辩术，在《条例》中比比皆是。邓小平就是用二元论代替两点论，用均衡论代替重点论，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以此欺骗群众，偷偷修改马克思主义路线，达到他贩卖修正主义黑货，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邓小平授意炮制《条例》，在工业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

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过是党的同路人。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丝毫没有改变，必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建国不久，邓小平就紧跟刘少奇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产阶级纲领，提出确保私有财产，确保土地买卖、雇工剥削、借贷和贸易的“四大自由”，竭力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一九五三年，当我们击退了资产阶级利用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卑劣手段破坏国民经济，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后，邓小平却公然为资产阶级辩护，说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绝大多数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有本领……我们不如资产阶级，要到上海去参观他们办的中小型企业。”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工业战线广大工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冲击了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束缚，破除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促进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一九六〇年，毛主席批示了“鞍钢宪法”，指出了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方向。邓小平却胡说什么：“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我们的错误是实际工作中做得过了火，结果违反了客观规律”；“工业中问题主要是乱”，要恢复生产秩序，就要“克乱求治”。一九六一年他主持制订《工业七十条》，塞进大量修正主义私货，并说这个条例“有针对性，就是为了专门治乱的。这几年把企业管理搞乱了，就是要把这种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公然对抗“鞍钢宪法”。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风头上认输，承认《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毛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一九七五年他重新上台后马上就翻案，说《工业七十条》“还是好的，还可以用，中央又没有废除它”。这就一语道破了天机，说明他亲自授意炮制的《条例》完全是《工业七十条》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可见，邓小平的这条路线，就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他迫不及待地抛出《条例》，其翻案复辟的实质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正当邓小平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正当邓小平为《条例》的出笼大唱颂歌，得意忘形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抓住了战机，亲自动手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粉碎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条例》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条例》，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阶级斗争熄灭了吗？

——评所谓“工作总纲”

一个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在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的第一条“工作总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纲。”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公然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塞进“总纲”，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目的就在于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

社会主义时期是不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是“历史的直接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当然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如此。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分析了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论》)。因此，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其他工作一样，也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我们厂从解放以来，到社教运动，又到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每前进一步，都是坚持对国内外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的结果。实践证明：“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什么时候抓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工厂企业就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各项工作就搞得生气勃勃。相反，什么时候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放松抓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抬头，路线就会偏差，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可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搞复辟倒退，拚命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极力否认工业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处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毛主席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的“工作总纲”中，大讲特讲工厂企业的主要矛盾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国家计划，从事自由生产、自由交换的非法活动”，是“资产阶级派性活动”、“争权夺利”，而唯独不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不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工作总纲”中对党内走资派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闭口不谈，只字不提呢？难道是偶然的疏忽和遗漏吗？决不是。恰恰相反，这正是表现了《条例》炮制者的细心和精心，如果把无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的矛盾也写进去，那岂不是要了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命吗？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一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时期内，我们工厂企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还是掌握在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手里的问题。工厂企业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我们厂搞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广大工人处于被管受压的地位，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的压抑，结果造成了产量、产值八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如果照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走下去，不但生产上不去，社会主义工厂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方向就会逐步改变，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工厂企业的状况有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工厂企业坚持什么方向，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上，斗争依然十分激烈。一九七〇年，林彪一伙曾把黑手伸进了造船工业，妄图扭转和改变